

##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he Pots with Dish-shaped Mouth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ree Kingdoms to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盘口壶的形制与功能

王睿 Wang Rui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 内容提要:

盘口壶, 壶式之一, 陶质、瓷质均有。西汉时期开始出现, 经历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 延续至隋唐五代时期。盘口壶造型独特, 有较为清晰的发展序列, 常被作为判定年代的佐证。根据出土器物自名推测,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鸡首壶(也有盘口)可能称作“罍”。本文主要对三国、两晋、南北朝盘口壶的出土情况进行初步的梳理, 以建立科学的盘口壶年代序列, 并对盘口壶的分布、功能及其他盘口器等相关问题有所探讨。三国时期盘口壶以矮胖型式居多, 西晋的盘口壶与三国时期不易区别。东晋时, 盘口壶向高大型发展; 南北朝时期束颈较高, 整体更协调。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盘口壶在很多地区都有发现, 以南京为最多。盘口造型最初可能是出于实用目的, 非实用的盘口则起到装饰的作用。

### 关键词:

三国两晋南北朝 盘口壶 形制 功能 罍

**Abstract:** Made of pottery or porcelain, the pots with dish-shaped mouth first appeare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got development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ree Kingdoms Period,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is type of pots is usually used as a reference of dating for their unique forms and clear developing sequences. According to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unearthed object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chicken-spout ewer (might be with dish-shaped mouth) was probably called “Ying”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ree Kingdoms to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current author mainly sorts out the unearthed pots with dish-shaped mouth in this period to establish the scientific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this type of pots and make a study on their distribution, func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issues. The majority of the pots with dish-shaped mouth in the Three-Kingdoms Period and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are similar for the short shapes with swelling bellies. The pots with dish-shaped mouth become bigger and taller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position of the contracted neck is higher and then these pots seem more coordinate as a whole. The pots with dish-shaped mouth in the period from Three Kingdoms to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re discovered in many regions, especially in Nanjing area. The dish-shaped mouth of the pot may start for the practical use and then play the role of decoration later.

**Key Words:** the Period from Three Kingdoms to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ots with dish-shaped mouth; forms; functions; Ying

盘口壶，壶式之一。口沿上折，口部形似盘子，束颈，鼓腹，无柄，但在肩部常有系（环形、桥形的附加物，供穿绳提携用）。大量出现于西汉时期，经历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延续至隋唐五代时期。不仅沿用时间长，而且分布地域广，汉代以后的盘口壶在全国许多地区有所发现。长江中游地区盘口壶的资料最为丰富，从战国至宋代均有发现。其他地区由于发掘资料所限，目前尚难以提供一个关于盘口壶完整的发展序列，有些地区发现较少，时间上仅限于一朝一代。

以往学术界对于汉代出土的陶质盘口壶有所探讨<sup>[1]</sup>，对于唐宋时期出土的盘口壶有较多研究<sup>[2]</sup>，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盘口壶的研究则相应较少，而此时段发现的盘口壶数量最多。鉴于上述原因，本文主要采用类型学方法，结合墓葬资料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土的盘口壶进行综合研究，以求建立这一时期的盘口壶年代序列，并进一步分析其造型与功能。

从质地上来看，盘口壶有陶质、瓷质、漆质和铜质的，瓷质盘口壶以青釉、黑釉为绝大多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盘口壶在全国较多地区的墓葬中出土，以江苏省为多，江苏省尤以南京为最多。发现地点主要有江苏南京<sup>[3]</sup>、扬州<sup>[4]</sup>、盐城<sup>[5]</sup>、句容<sup>[6]</sup>、镇江<sup>[7]</sup>、无锡<sup>[8]</sup>，浙江安吉<sup>[9]</sup>、宁波<sup>[10]</sup>、东阳<sup>[11]</sup>、嵊县<sup>[12]</sup>、杭州<sup>[13]</sup>、黄岩<sup>[14]</sup>、温州<sup>[15]</sup>，湖北鄂州<sup>[16]</sup>、黄冈<sup>[17]</sup>、武汉<sup>[18]</sup>、荆门<sup>[19]</sup>、宜昌<sup>[20]</sup>、大冶<sup>[21]</sup>，湖南耒阳<sup>[22]</sup>、资兴<sup>[23]</sup>，江西赣县<sup>[24]</sup>、鹰潭<sup>[25]</sup>，安徽和县<sup>[26]</sup>、繁昌<sup>[27]</sup>、当涂<sup>[28]</sup>，河南南阳<sup>[29]</sup>、浙川<sup>[30]</sup>，福建福州<sup>[31]</sup>、建瓯<sup>[32]</sup>、南安<sup>[33]</sup>、政和<sup>[34]</sup>，广东和平县<sup>[35]</sup>，广西恭城<sup>[36]</sup>等地。

## 一 型式分析

依据盘口壶颈部变化，分为五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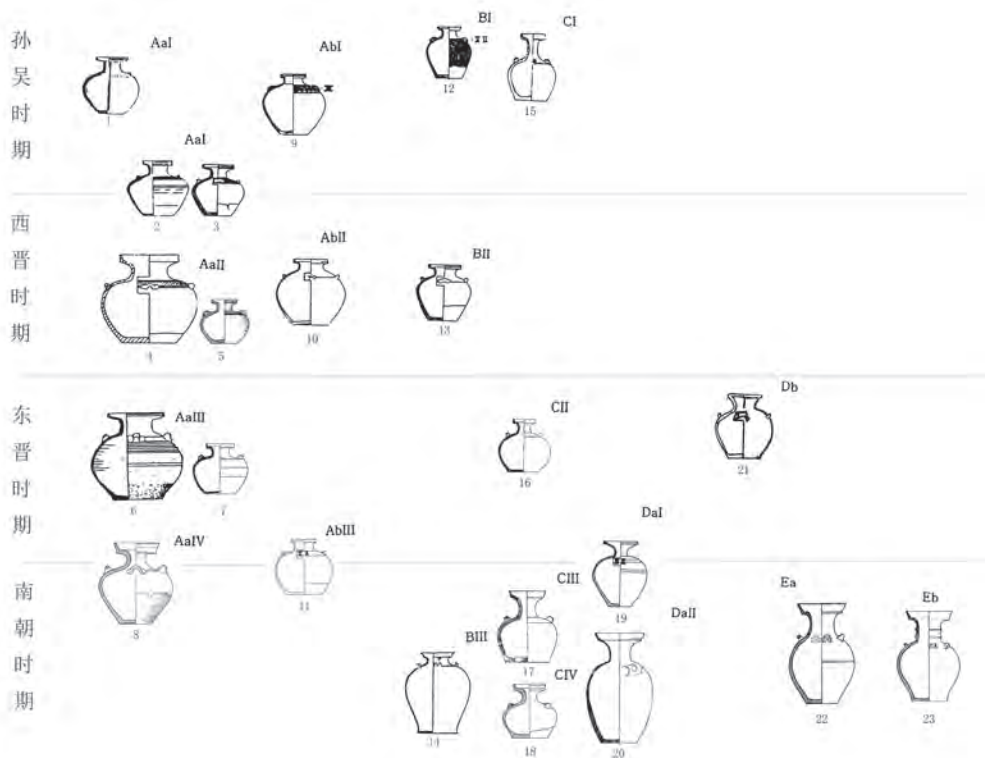
A型 直束颈。多扁鼓腹，平底或凹底。肩置双系或四系，口外壁饰一道或两道弦纹，肩多有几何纹饰带。器身最大腹径略大于器高，形体矮胖。

Aa型 束颈较高。

I式 扬州 M70:2<sup>[37]</sup>，广圆肩，肩置双系，系饰焦叶纹，并饰有铺首衔环，肩周有弦纹、网纹和芝麻花纹带饰。釉色米黄，不及底。口径13、腹径22.5、高22厘米（图一：1）。扬州 M89:16<sup>[38]</sup>，盘口外侈，外缘饰两道凹弦纹，鼓腹，平底。肩置四泥条状环系和凹弦纹两道，芝麻花纹带饰，较为模糊，腹下有弦纹。釉不及底，色青微黄，碎开片。口径12.2、腹径24.2、高22厘米（图一：2）。湖北鄂城 M19：1<sup>[39]</sup>，颈略细长，肩浑圆。在肩部有两道凹弦纹、网格纹加三角纹组成的装饰纹带。口径10、底径8.6、最大腹径17.2、高16.8（图一：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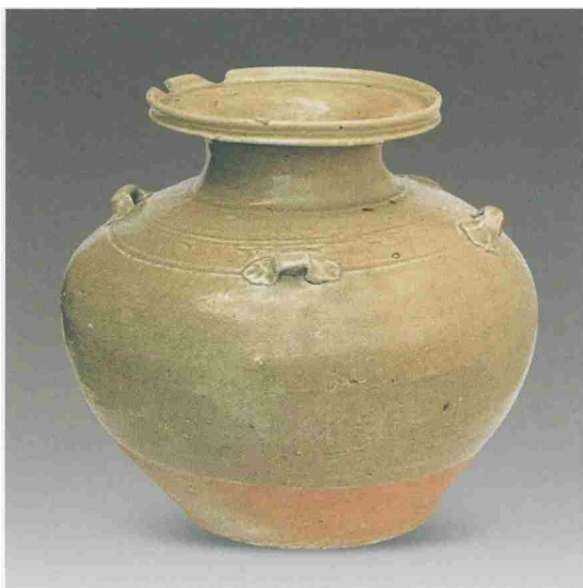
II式 束颈内收，略耸肩。湖北鄂城 M1 出土盘口壶<sup>[40]</sup>，尖圆唇，盘口较高，颈粗矮，扁鼓腹，肩腹之际有弦纹网格花纹装饰，四横系，平底。灰白色胎，烧结，黄绿釉较有光泽。通高16.8、口径11.2、最大腹径18.4、底径10.2厘米（图一：4）。浙江吉安 M2：7<sup>[41]</sup>，盘口缩颈，丰肩弧腹，平底内凹。施青绿色釉，不及底。肩饰弦纹，间以斜方格纹，贴双系。高17.3、口径10.1、底径10.2厘米（图一：5）。

III式 束颈，颈粗短，形体矮胖。湖北枝江 M2 出土盘口壶<sup>[42]</sup>，盘口，细颈，鼓腹，平底，肩有四个对称桥形小钮。内外施豆青釉。鱼子纹片，内外下腹及底露灰白胎。口径14、腹径23、通高22厘米（图一：6）。扬州 M5：3<sup>[43]</sup>，盘口较大，短束颈，耸肩，弧腹内



图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盘口演变图

1.AaI式(江苏扬州M70:2) 2.AaI式(江苏扬州M89:16) 3.AaI式(湖北鄂城M19:1) 4.AaII式(湖北鄂城M1) 5.AaII式(浙江吉安M2:7) 6.AaIII式(湖北枝江M2) 7.AaIII式(江苏扬州M5:3) 8.AaIV(河南浙川M79:2) 9.AbI式(南京邓府山吴墓:5) 10.AbII式(湖北鄂州M3:3) 11.AbIII式(南京M5:1) 12.BI式(湖北鄂城M2:3) 13.BII式(湖北鄂城M2:5) 14.BIII式(江西赣县) 15.CI式(湖南资兴) 16.CII式(江苏扬州M4:3) 17.CIII式(江西赣县) 18.CIV式(江西鹰潭M2:2) 19.DaI式(南京M6:2) 20.DaII(浙江东阳南朝墓) 21.Db型(南京M6:1) 22.Ea型(湖南资兴M474:1) 23.Eb型(湖北大冶M1:2)



图二 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M1出土青瓷盘口壶

收,凹底。肩饰四系,二桥形系,二泥条形系。四系间各饰一褐色斑块,器身饰弦纹,施淡青釉,近底部无釉。口径10.6、腹径20、高18.5厘米(图一:7)。

IV式 细长颈,形体瘦长。河南浙川M79:2,圆唇,盘口斜壁,短束颈,上腹尖鼓,以下弧收,最大腹径在上腹部。口径5.4、底径3.8、高9.5厘米(图一:8)。山东临沂M1西:12<sup>[44]</sup>,肩附四系,并饰有凹弦纹。平底,施青灰釉,釉不及底。口径14.7、底径13.8、高22厘米(图二)。

Ab型 束颈较短。

I式 南京邓府山吴墓:5<sup>[45]</sup>,

圆唇,直口,腹部最大径靠上,下腹内收。凹底。盘口有一道凹弦纹,肩部有对称的四蕉叶

纹耳及两圈花纹，上为半圆弧纹，下为波浪纹，中间以凹弦纹相隔。下腹及器底胎较厚，器口上至腹施淡黄釉，下腹及底部露胎。口径 11.9、底径 12.5、高 29 厘米（图一：9）。

II 式 湖北鄂州 M3：3<sup>[46]</sup>，盘口稍深，颈粗短，溜肩，在肩部饰凹弦纹一周。口径 13.3、底径 14、高 25.8 厘米（图一：10）。

III 式 南京 M5：1<sup>[47]</sup>，盘口微侈，肩、腹部球形鼓圆，底稍内凹。肩部置 6 系，两侧横系各一，另两侧竖系各二。青釉泛黄，下腹及底部露胎。口径 8.8、底径 12、高 19.6 厘米（图一：11）。

B 型 颈粗且短。高度大于最大腹径，平底或凹底。

I 式 湖北鄂城 M2：3<sup>[48]</sup>，尖圆唇，圆肩，鼓腹下收，平底略内凹，最大腹径在中部偏上。在肩部，有二对称的双系并饰一道凹弦纹。腹饰麻布纹。器外施釉，釉色褐中泛绿不及底。口径 13.9、底径 15、最大腹径 26.3、高 29.7 厘米（图一：12）。

II 式 湖北鄂城 M2：5<sup>[49]</sup>，浅盘口，短粗颈，溜圆肩，鼓腹下收，平底略内凹。最大腹径在中部偏上。肩部有凹弦纹一周，并有四个两两相对的由泥条捏制而成的横耳。器外施釉，不及底，釉已全部脱落。口径 12.6、底径 11.2、最大腹径 21.4、高 21.7 厘米（图一：13）。

III 式 江西赣县出土品<sup>[50]</sup>，大盘口，肩饰六个对称桥形系，二道弦纹贯串六系，敞口微侈，口沿底饰对称垂耳一对，束颈，鼓腹，腹壁下收，平底。釉色完好，胎质厚重。口径 17.2、底径 20.5、腹径 35、高 42 厘米（图一：14）。

C 型 束颈底部内收，小盘口。

I 式 湖南资兴 M377：5<sup>[51]</sup>，小盘口，细颈，圆腹，大平底。肩附四个对称的直穿桥形系。四系之间有两道弦纹。施黄绿釉，大部分已剥落，底露青灰胎。高 18.6、盘口径 7 厘米（图一：15）。

II 式 扬州胥浦 M4：3<sup>[52]</sup>，小盘口，细束颈，丰肩，鼓腹内收，饼足底。肩饰桥形双系，饰两道弦纹。施淡青釉，近底部无釉。口径 8、高 20 厘米（图一：16）。

III 式 江西赣县出土品<sup>[53]</sup>，盘口，束颈，圆肩，斜腹，平底。肩上附半环双系。高 20、盘口径 10.3、底径 12.5 厘米（图一：17）。

IV 式 江西鹰潭 M2：2<sup>[54]</sup>，通高 19 厘米；盘口直径为 9、盘口高 2.2 厘米；壶最大径在肩部，为 16 厘米；盘口之下为壶颈部，高为 4 厘米，颈部内径为 2 厘米。双系位于壶肩部，呈 180 度对向分置于壶颈部两侧。平底，底径 10.8 厘米（图一：18）。壶表面施青釉，釉未过腹，釉层有釉流、开片和剥落。

D 型 束颈较高，盘口较大，较以往型式变化较大。

Da 型 窄束颈。

I 式 束颈明显。南京 M6：2<sup>[55]</sup>，口稍敛，束颈，肩、腹部浑圆，最大腹径偏上，下腹稍内收，平底。肩、腹部各饰二道凹弦纹，两侧各置两个蕉叶纹耳。器表通体施青釉。口径 18.6、底径 12.6、腹径 29.7、高 35.4 厘米（图一：19）。

II 式 体形较高，束颈较长。浙江东阳南朝墓出土 1 件<sup>[56]</sup>，上口呈浅盘口式，口沿微向外敞，束颈圆肩，下腹内收，平底。淡黄色釉，多已剥蚀，釉下有一层淡黄色瓷衣未脱落，胎质呈红色，细腻。口径 17.2、束颈径 6、颈长 7.2、腹径 22.8、底径 13、通高 38.6 厘米。肩两边有双系，左右对称（图一：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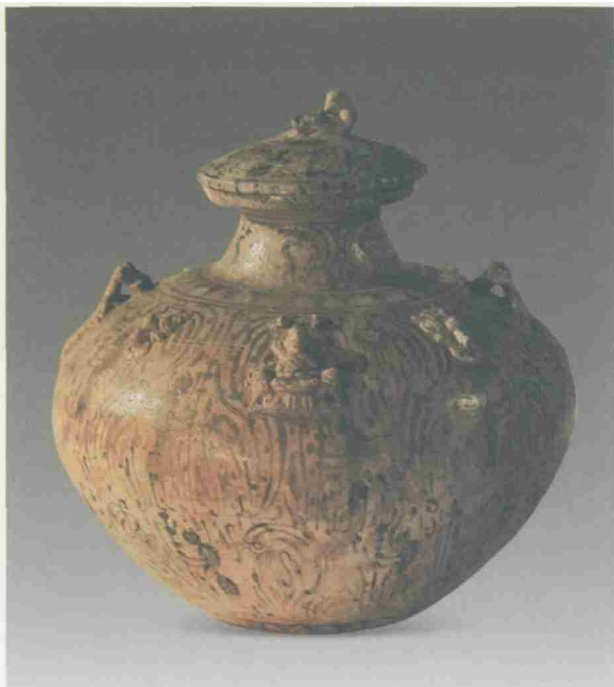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盘口壶均为平底。三国时期盘口壶主要发现于长江中下游的吴国统治区里,以矮胖型式居多;西晋以来的盘口壶与三国时期不易区别,发现地区也集中于长江中下游。东晋时,盘口壶逐渐发生了变化,向高大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保留了东晋时的高度,束颈较高,整体更协调。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盘口壶在湖北、湖南、河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山西、辽宁均有发现(图三)。其大体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江苏省南京市发现最多,可能与其处于三国两晋南朝政权统治核心区有关;北方发现的数量相对较少,这种情况或许是和当时北方居民以少数民族居多,其习俗不同于汉族有关。

## 二 盘口壶源流、纹饰、造型及功能探讨

从现有的发掘资料和综合研究可知,具有“盘口”这一特征的陶壶从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零星出现,到两汉时期得到充分发展,除陶质外还有铜、漆等质料。汉代陶质盘口壶中高圈足、彩绘、带铺首衔环一类出现的时代比较早,其最初可能是以仿青铜器的面貌而产生的;而另一类平底少纹饰的盘口壶在形制上与东汉的原始瓷质盘口壶和三国两晋时期出土的青瓷类盘口壶有很大的相似性<sup>[60]</sup>。

三国时期,由于瓷器在当时还是一种兴起不久的新产品,所以此阶段的盘口壶在造型和装饰上基本是承袭汉代,较多地吸取了陶器、铜器和漆器等的形式和图案花纹。常见的弦纹、水波纹、铺首、兽头足和耳面印叶脉纹等装饰<sup>[61]</sup>,也是汉代常用的,从整体上看却比汉代还简单,因为适合于陶器的彩绘纹饰已不见于瓷器上。吴末、西晋初,越窑、瓯窑已有较长的制瓷历史,生产经验丰富,造型和装饰艺术有了很大的提高,陶瓷工艺渐趋成熟,不再仿照青铜器。孙吴至西晋初期在盘口壶上出现了彩装饰,例如江苏南京雨花台一座吴末晋初墓中出土的青瓷釉下彩带盖盘口壶,其纹饰较为复杂(图四)<sup>[62]</sup>。南北朝时期,南方最常见的盘口壶,北朝也有出现<sup>[63]</sup>。如封氏墓出土的四系青瓷盘口壶,壶身瘦长,盘口较小,颈部较高,平底,和南朝的青瓷盘口壶形制相似<sup>[64]</sup>。在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窑址中都有盘口壶发现。

盘口是盘口壶的显著特征,如果将盘口作为器物的突出特征来考察,那么在中国物质文化发展史定名中含有盘口的器类有盘口罐、盘口尊、盘口壶和盘口瓶、盘口长颈瓶等。同时,还大量存在自身有盘口的形制、定名中不含盘口称谓的器物,如鸡首壶、唾壶等。这些



图四 江苏南京长岗村吴末晋初墓M5出土青瓷釉下彩盘口壶

器物尽管总体形制不同，但是都具有特征鲜明的盘口。其中鸡首壶是和盘口壶关系最密切的无盘口定名的盘口器，因肩部塑鸡首型式而得名。鸡首壶有其自身发展的一些特点，出现于三国末年两晋时期的越窑，以后各地瓷窑都有烧制，流行于两晋至隋唐。早期的鸡首壶多数是小小的附于盘口壶的肩部，鸡头均系实心，完全是一种装饰。东晋时，壶身变大，前装鸡头，引颈高冠，鸡尾消失，后安圆形把手，上端粘在器口，下端贴于上腹。到东晋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饰龙头和熊纹。南北朝时期，壶体修长，鸡首的冠部较大，颈部细长，盘口增高，造型更加适合于实用。隋代的鸡首壶趋于写实，作昂首曲颈打鸣状，壶柄形似。唾壶是古代贵族宴饮唾鱼骨或兽骨的承器，瓷质唾壶始自东汉，三国、两晋颇为流行。南朝时，有的还配以盖和托盘，更合于卫生、实用。隋唐造型基本沿袭南朝旧制。五代及宋、辽、明清仍然使用。唾壶是从用途角度对其定名的，它流行时间比较长，可能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更高，它流行的时间甚至长于盘口壶，或者说到了后来，盘口壶的功能有了其他器物来替代，而唾壶的功能则始终如一。无论从形制上还是功能上分析，唾壶的盘口和盘口壶的盘口都是不同的，唾壶的盘口造型有着不言而喻的作用，其盘口部没有折棱，是平滑的；盘口壶的盘口部多有明显的折棱，多数是配合盖子使用的。及至唐代，盘口壶发展出一类特殊器形——龙柄盘口壶，因在其肩部与盘口间塑造双拱背龙形柄而得名。与常见的盘口壶相比，龙柄盘口壶颈部较细，主要是为配合左右两个龙柄，以取得平衡之美。从用途上看，龙柄盘口壶绝非一般实用器。

定名中含有盘口的器类中，盘口罐矮胖，盘口瓶瘦高，盘口壶居于其中，这种形制上的不同或许反映了它们功能上存在一些差异。盘口罐作为一种盛储器，可以用来贮存蔬菜；而盘口尊、盘口壶和盘口瓶可能是用来盛水、酒类液体的。出土的盘口壶有的盖有器盖，有的没有盖器盖。但是从器物的造型分析，盘口壶都应当是有盖的，既可以是专门的器盖，也可以碗、盘代替。盘口设计既易于密封又易于打开。盘口易于置盖密封，易于倾倒，没有流的状态下，盘形口倾倒时，液体无法沿器外壁流下而造成浪费和麻烦。

瓶壶状器物以“罍”为名，在墓葬中始见于晋代。南京化纤厂东晋墓出土1件青瓷鸡壶的底部刻“罍主姓黄名齐之”，据此，推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种盘口壶也称作“罍”<sup>[65]</sup>。仔细分析其前后文，实际说的是六朝时期“鸡首壶”可能作“罍”。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丧葬使用粮罍作为明器在南北朝已盛行<sup>[66]</sup>，但造型是鸡首壶或盘口壶形制尚无法考证，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盘口壶和鸡首壶二者关系密切。唐晚期瓷罍的形状与六朝、初唐时习惯上称盘口壶或瓶相似<sup>[67]</sup>，曾先后发现几件腹部刻有自名为“罍”的器物，有的罍上有蟠龙纹<sup>[68]</sup>，有的罍上刻字代做买地券和墓志铭<sup>[69]</sup>使用。唐宋时期，粮罍基本上已经是明器类<sup>[70]</sup>，有学者认为粮罍明器具有亡者灵魂栖息的功能<sup>[71]</sup>。

盘口壶的使用贯穿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盘口壶的盘口造型最初可能是出于实用目的，且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用途；而出于非实用目的，一些器物采用盘口，盘口则起到了装饰的作用。

注释：

[1][60][61] 王睿：《两汉时期陶质盘口壶初探》，  
《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

2010年。

[2] 王光尧：《唐代龙柄盘口壶研究》，《华夏考古》

- 1999年第3期;周世荣:《湖南出土盘口瓶、罐形瓶和牛角坛的研究》,《考古》1987年第7期;黄义军:《南方宋墓出土盘口瓶和多角坛的分区研究》,《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王铭:《唐宋时期的明器五谷仓和粮器》,《考古》2014年第5期。
- [3] 尹焕章:《南京石门坎发现魏正始二年的文物》,《文物》1959年第4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6期;南京博物院:《江苏江宁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狮子山、江宁索墅西晋墓》《考古》1987年第7期;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邓府山吴墓和柳塘村西晋墓》,《考古》1992年第8期;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博物馆:《南京南郊六朝谢琬墓》,《文物》1998年第5期;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博物馆:《南京南郊六朝谢温墓》,《文物》1998年第5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石子岗东晋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2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南京市雨花台区姚家山东晋墓》,《考古》2008年第6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栖霞区东杨坊南朝墓》,《考古》2008年第6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胡村南朝墓》,《考古》2008年第6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灵山东晋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1期;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南朝刘宋墓》,《考古》2013年第4期;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丹路东晋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6期。
- [4][37][38][43][52] 胥浦六朝发掘队:《扬州胥浦六朝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 [5] 盐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盐城市博物馆:《江苏盐城市建军中路东汉至明代水井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11期。
- [6] 南波:《江苏句容西晋元康四年墓》,《考古》1976年第6期。
- [7] 镇江博物馆:《镇江东吴西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
- [8] 无锡市博物馆:《无锡赤墩里东晋墓》,《考古》1985年第11期。
- [9][41] 程亦胜:《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文物》1995年第6期。
- [10] 林士民:《浙江宁波云湖窑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浙江宁波市蜈蚣岭吴晋纪年墓葬》,《考古》2008年第11期。
- [11][56] 赵宁:《浙江东阳县李宅镇南朝墓》,《考古》1991年第8期。
- [12] 嵊县管委会:《浙江嵊县六朝墓葬》,《考古》1998年第9期。
- [13]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晋兴宁二年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7期。
- [14]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黄岩秀岭水库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 [15] 施成哲:《浙江温州市瓯海区发现东晋纪年墓》,《考古》2010年第6期。
- [16] 湖北省博物馆:《鄂城两座晋墓的发掘》,《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鄂州市博物馆:《湖北鄂城吴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7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湖北鄂州市塘角头》,《考古》1996年第11期;湖北省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湖北鄂州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年第11期。
- [17] 黄冈市博物馆:《黄冈铝厂南朝墓葬》《江汉考古》1997年第4期;刘松山:《湖北黄梅县松林咀西晋纪年墓》,《考古》2004年第8期。
- [18]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江夏区博物馆:《武汉江夏龙泉南朝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
- [19] 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市麻城镇斗笠岗南朝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6年第2期。
- [20] 宜昌市文物处:《宜昌市六朝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宜昌地区博物馆、枝江县博物馆:《湖北枝江县拽车庙东晋永和元年墓》,《考古》1990年第12期。
- [21][59] 大冶市博物馆:《大冶市六朝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97年第4期。
- [22] 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耒阳城管六朝唐宋墓》,《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衡阳市文物处、耒阳市文物局:《湖南耒阳白洋渡汉晋南朝墓》,《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
- [23][51][58]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晋南朝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 [24][53] 赣州地区博物馆、赣县博物馆:《江西赣县南朝宋墓》,《考古》1990年第5期。
- [25][54] 许智范、李放:《江西鹰潭上清林场王家山南朝墓》,《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 [26]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和县文物组:《安徽和县



- 西晋纪年墓》，《考古》1984年第9期。
- [27] 繁昌县文物管理局：《安徽繁昌顺凤山林场南朝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
- [2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当涂青山六朝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4期。
- [29] 南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南阳住宅修缮公司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
- [3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浙川下寨遗址东晋至南朝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期。
- [31] 曾凡：《福州洪塘金鸡山古墓葬》，《考古》1992年第10期；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市台江区龙岭小学南朝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2012年第1期。
- [32]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南平市博物馆：《福建建瓯市东峰村六朝墓》，《考古》2015年第9期。
- [33] 福建博物院、泉州市博物馆、南安市博物馆：《福建南安市皇冠山六朝墓群的发掘》，《考古》2014年5月。
- [34] 福建博物院：《福建政和石屯六朝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2期。
- [35]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县博物馆：《广东和平县晋至五代墓的清理》，《考古》2000年第6期。
- [36] 俸艳：《广西恭城县黄岭大湾地南朝墓》，《考古》1996年第8期。
- [39][48][49] 鄂州市博物馆：《湖北鄂城吴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7期。
- [40] 湖北省博物馆：《鄂城两座晋墓的发掘》，《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
- [42] 宜昌地区博物馆、枝江县博物馆：《湖北枝江县拽车庙东晋永和元年墓》，《考古》1990年第12期。
- [4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化局：《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2005年第7期。
- [45]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邓府山吴墓和柳塘村西晋墓》，《考古》1992年第8期。
- [46]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湖北鄂州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年第11期。
- [47] 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博物馆：《南京南郊六朝谢温墓》，《文物》1998年第5期。
- [50] 赖斯清：《江西赣县白鹭南朝墓》，《考古》1994年第7期。
- [55][57] 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博物馆：《南京南郊六朝谢琬墓》，《文物》1998年第5期。
- [62] 易家胜：《南京出土的六朝早期青瓷釉下彩盘口壶》，《文物》1988年第6期。
- [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北朝及唐代墓葬》，《文物》1998年第3期；李爱国：《太原北齐张海翼墓》，《文物》2003年第10期。
- [64]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69页。
- [65][67][69] 同[64]，第194页。
- [66] 王铭：《唐宋时期的明器五谷仓和粮器》，《考古》2014年第5期。
- [68] 王士伦：《余姚窑瓷器探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8期；金祖明：《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 [70] 王铭：《唐宋时期的明器五谷仓和粮器》，《考古》2014年第5期。
- [71] 马昌仪：《寄魂信仰探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责任编辑 霍宏伟）